

Views on the loanwords in the Modern Chinese

ZHANG X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everal different borrowing ways of the Chinese loanwords, especially the transliterated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words from Japanese have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 On the basis of it, both of the traditionally distinguished transliterated words and paraphrased words have been theore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abuses of the very distinction have been pointed out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oanwords; transliterate; paraphrase; Chinese character words; letter words; submorphology

现代汉语借词研究

张 旭

提 要: 本文主要讨论了现代汉语外源词——文中相对于汉语自源词而称之为他源词——的几种借用方式, 其中尤其对辗转借自日语的汉字的音译特点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议; 在此基础上, 结合汉语中的借词实例, 对传统区分的所谓音译词和意译词做了理论分析同时也指出了强作区分的弊端。

关键词: 现代汉语 借词 音译 意译 汉字词 字母词 亚形态

一 引言

1. 1借词属于语言接触中一方把另一方的词汇单位移植为自己的词汇单位的语言局部融合现象。特别是现时代,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种语言完全独立而不跟任何别的语言发生接触, 因此不会也不可能产生它与别种语言之间的任何方向上的借词。

借词固然是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一种结果, 但就其本质而言, 主要属于语言词汇宏观表意功能的自我调节作用, 调节的形式表现为单方面扩大借方语言的词汇容量而结果并不导致语言机制的更大的变异。在语言中, 对自身机制起决定性制约作用的是语法。所以, 借词作为一种由借方语言主动吸收的词汇成分, 其本身的借词身份的实现从根本上说是由语法决定的, 换句话说, 是原来的非本族语的某些词汇单位经过借方语言的语法消化, 在完成形式即语音方面的调整亦即实现由贷方语言向

借方语言的词汇形态的形式转移之后，才取得借词资格和进入借方语言的。譬如汉语中的借词，既然称之为借词，那就是实际上已经承认，它们完全具备了作为汉语一般词汇单位的内在品质和形态特点，因此属于名副其实的汉语词汇成员。从语言跟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意义看，借词的出现无异于不同历史时期的新词的产生，所不同的，仅仅是借词具有它赖以产生的独特的非本土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日语、朝鲜语和越南语都跟汉语有过长期频繁接触的历史。伴随着文化交流，这些语言都从汉语中吸收了大量的词汇单位。其中有的语言，源自汉语和其他语言的借词的数量甚至超过自身词汇总量的半数。如此惊人的词汇借用的事实，很容易使人产生借用语言会不会因此发生语言蜕变的忧虑。其实，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刚才我们说过，借词过程因为经过必要的语法消化而不会引起借方语言机制的变异。恰恰相反，借词所产生的作用是十分积极的。日、朝、越等语言利用汉语的现成词语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词汇，历史证明，这些拥有大量借词的语言的词汇，其中不论那种来源性质的成分，都毫无区别地模范地履行了它们的作为语言建筑材料单位的职责。在很多现代语言里，相当数量的古代借词由于在最初移植时或者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之后，完全实现了形态和意义的本土化，除非少数专事考证的学者，很少有人能够辨其本原；而即使是现在，借词现象依然跟古代一样不断发生，出现在某些语言中的某些借词，或许由于“新借”或者在借用过程中语法消化不够彻底等原因，一定程度上还表现着比较明显的非自源词的形态特点，因此人们凭借对自己语言的强烈的语感依然能够判断出它们的借词身份，但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短期的，最终它们总是要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本土化而与自源词彻底归于一统。

1. 2不待说，汉语在自身发展演化的漫长历史中，也曾经通过与外族文化的交流积极地吸收别的民族语言的词汇单位以充实和丰富自己。汉唐

时期，由于宗教传播，梵语流入中国，很长时间内梵语成为汉语中借词产生的重要源泉。“佛”、“塔”这些当时曾是典型的专门术语的梵语借词，随着佛文化的广泛的宣教作用，逐渐发展为汉语的一般词汇单位。宋元以降，汉语中亦见有源自其他语言的借词但数量不多，至清末民初，其势大增，中华民族的思想先行者们通过日语接受西学，源自西方的科学技术名词通过日语辗转进入汉语。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吸收很多西方名词，特别是这些名词当时不像现在用片假名实行音译而是一例采用汉字意译，因此无须经过任何改造程序便可直接移入汉语。进入汉语后，由于这些日语借词的天然的汉语形态特点和通过汉字所反映出来的类似汉语自源复字的意义表现功能，以至于在说汉语的中国人眼里简直无异于任何的汉语自源词，仿佛它们天经地义就是由汉语直接创造出来的词汇单位，譬如思想、思潮、革命、文明、文化、经济、教育、共和、观念、干部、支部、场合等，几乎全无借词痕迹。日语由汉语借入汉字，利用借来的汉字译词造词尔后再输入汉语的现象，堪称是当代文化接触和语言接触所形成的一大奇观（陈原，2003）。

1. 3现代汉语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日源借词，同时也不少直接源自西方语言的借词，后者尤以现阶段借入者为著。西方语言的词汇形式，特别是现代科学用词，多数音节繁复，一般很难采用汉语的单字或双音节复字形式成译。传统的做法是，譬如遇到表意复杂而相应地音节结构也很长的词语，或者只译词首，或者略译其中的某些成分，尽量使音译的结果符合汉语复字为词的习惯形式；但晚近以来，汉语中的西语借词变得相对灵活，借词形式不仅允许突破双音节，譬如冰激淋、基督教等；而且出现了摒弃音译而直接袭用西语文字形式的借用方式，致使汉语书面语中杂入相当数量的所谓“字母词”，譬如X-光、B超、T恤、CT、WTO等。

文字，原则上只是用来记录语言而本身并非语言。可是我们注意到，

这种认识实际上有失偏颇（徐通锵，1997）。很多事实说明，文字不仅仅记录语言因而属于语言的附庸，其实很多时候表现为语言的一部分和直接行使语言的作用，譬如经常积极而有效地解决语言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同音词的区别问题。至于借词，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近年来开始允许少量采用原来的拼音文字形式的借词直接进入汉语的领地。汉字音译或者径直采用西文而成就的借词，以其所采用的音位性质的文字表音形式而与一般汉语自源词的传统形态相区别，我们称之为“亚形态”。

二 借词的性质与传统借词

2. 1严格说来，所谓借词的观念并不是很科学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顾名思义，借词的观念似乎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某个词归于这种语言时是自源词，归于那种语言后则为他源词。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一物借出则该物当立即从原来的地方消失；但从语言学的意义看，情况则并不是这样，而是一个词成为借词后却并不改变它在原来语言中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借词产生的过程与其说是借用，毋宁说是仿制，因为在借用的过程中，被“借”的词并不走出原来的语言，只是借用语言以它为样本，按照自身语言的语法要求另外造出一个形态仿似而意义全同的词。既是仿制，则不免在形式上衍生出来一些变化，不可能做到全真复制；其二，既称之为借，则又要求词在借用前后具有最大程度的形式上的一致性，这就等于只承认音译的借词而不承认意译的借词。由此看来，借词既然不能保证借用语言全息获得它所要求的词汇单位，则这观念的建立，至少是不够严谨的。

关于借词这名称，现在许多的语言学著作已经不用或很少用，比较多的是称作外来词。称为外来词仅以自源和他源两义相区别，避免了上

述借词作为科学术语的不耐推敲的弊端。但也另有值得斟酌的地方，那就是，所谓“外来”，凡保持或部分保持了词在原来语言中的语言特征的固然属于外来词，把这种保持关系推及意义即一般借“意”的词似乎也当承认它们的外来词资格，然而事实上不是。譬如，咖啡、啤酒为外来词，电脑、手机则不是。这就是说，仅仅是观念的引进，语言学不把它定义在外来词的词汇范畴。这样看来，所谓借词和所谓外来词，就术语的内涵而言没有区别。

其实，借词主要在于借意，以哪种形式承载意义并不重要。就汉语而言，借形即实行所谓音译实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譬如“电灯”、“电话”这两个词，它们所代表的事物开始出现时曾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大标志。这两件东西固然原本为中国所无，但相应的两个词却都是直接由借意而得，因为说汉语的人们很容易为这两件新生事物命名。在中国，“灯”这种用以照明的家居必备之物古已有之，而新出现的一种灯，它不用油而以电能为发光之源，故而称之为“电灯”，这在说汉语的人们看来可谓名正言顺；能够帮助两个人实现异地交谈的设备却为中国历史所无，但考虑这种设备实际也是利用电能实现通话，人们因而造出“电话”这个词来似乎也正属于汉语缘意造词之常例。倘若为英语称之为coffee的这种迄今仍为中国所无的东西命名，则由于这种饮料既非茶类，亦非酒品，比物造名固已不可，凭空颁名反不如音译凿然有据，因而采用古代联绵词的“两个字连缀成义”的成词方法，最后音译而得“咖啡”这个一直用到今天的名词。医学名词而后来亦为民间所知的“盘尼西林”这个词，初为英语penicillin的音译，所表示的是一种药品。直接采用音译的这个名字虽有直截了当之便，但译名音节繁复，明显使人感觉不像汉语成分，所以在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便有深得汉语构词要义的人想出“青霉素”这上好的名字取而代之，并且因为它符合汉语习惯而一直沿用至今。总之，借词本质在于借意；至于借词的词汇形式，则应该是

在已经实现借意的前提之下尽可能地符合汉语造词习惯。从社会学的意义说,操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人都从心理上排斥音译。汉语从别的语言中借词而一时无法自名的,最初的翻译家其实也曾挖空心思尽可能地使音译形式更多地带上一些汉语或汉字的特点,只是做起来并不很容易。

2. 2从历史看,按照上述标准,汉语借词——在说明词的语言归属关系时用借词比用外来词比较便于指称,所以本文还是选择借词这个术语——大致分为这样两种情况:

一种是为了实现音译,利用现成汉字,以形声原则再造新字。在这方面,严复译《社会通诠》书中论“蛮夷社会”一章有下面一段文字(陈原,2003):

“澳洲之土人,无树艺也,无牲畜也,所豢扰者,舍狗而外,无余禽兽。木处而巢伏,土处而穴居,宫室屋庐,无其观念。求食则伏丛莽深箐之中,以伺菽者,若哇啦,若噍呻。”

其中的“哇啦噍呻”四个字^①,严氏所记均一例左边从鼠,右边记声。严氏为其中“哇啦”做译者注云:“哇啦”“读洼拉,似刚迦鲁而小,土人以为食。”所谓“刚迦鲁”即英语kangaroo的音译,“哇啦”则为英语wallaby的音译。其实这里所描写的动物无论大小,后来的文献两者都称之为“袋鼠”。所指相同,又都是他邦之物;因为中国没有这种动物,汉语也就没有相应的名词,严氏当时只能以音译的方法临时为这两个怪物命名。“袋鼠”是在音译形式失败之后复以意译获得的名字,但是按照借词的定义原则意译不属于借词,因此“袋鼠”这名字,理论上还只能算是为称呼外邦事物而设计的一个汉语自源词。

“哇啦”之类汉字的形声造字法,代表了汉语传统上成就借词的重要手段。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现有汉字增加“口”字形旁而为借词提供有别于传统汉字的音译符号。《汉语大辞典》“口”部所收汉唐时期源自梵语的佛教借词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实现音译的。著名的“唵”、“嘛”、

“呢”、“叭”、“咪”、“吽”等佛教徒所谓“六字真言”全都写的是带“口”的汉字。用加了“口”字偏旁的汉字为借词表音的方法，可能是最适合汉语并且有望实现“汉化”的方法，因此汉唐以后一直绵延不废。即使今天，我们也还能看到用这样的方法音译而为借词的，用的较多的是医药名词，譬如：嘧啶（英语 pyrimidine）、噻唑（英语 thiazole）、喹啉（quinolinc）、哌嗪（piperazine）。实际上不仅音译，很多时候意译也都采用“口”旁汉字，譬如原来表示英尺的“呎”和表示英两的“𪔐”。当然，在汉语中，并非所有的“口”旁汉字都属于当初为成就借词而造。现代汉语中习常所用的感叹词、语气词大都使用了带“口”字偏旁的汉字，那是纯粹的形声字，根本与借词无涉。而外还有些传统的带“口”字偏旁的汉字，包括某些有时用于音译借词的汉字，它们都有自身的完全属于汉语性质的产生背景，也跟借词没有因缘，譬如“吗啡”的“吗”，“啧啧”的“呐”。

另一种借用方法是直接利用现有汉字音译。从不采用汉字的语言里获得借词，直接用汉字实行音译的结果是造成联绵词。这里，我们把联绵词用于广义，即形式上不限于双音节复字，并且音节形态也不以双声、叠韵为限。事实上现代学者论及联绵词时也早已突破双声、叠韵的限制，譬如很多现代汉语词汇学著作都把“芙蓉”、“妯娌”，甚至把一些双音节的叠音词“星星”、“奶奶”等，都包括在联绵词的范围之内。这样看来，多年来已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满语借词“萨其马”、英语借词“巧克力”等等，就都属于具有联绵词表意特点的借词。当然，就贷方语言而论，后来成为借词的某些词汇单位形式上未必都属于多音节，也有许多原来是单音节的。对于这种情况，考虑现代汉语词汇单位以双音节为主的总的形态特征，音译过程中常常须要对所待借用的单位实行音节“繁化”，也就是在经过音译已经获得的属于借词性质的汉字后面，补充另一个通常用以表示“义类”的汉字，以帮助借词尽可能多地具备汉语词

汇单位的一般特点，譬如：菠菜、啤酒。有时，音译过程已经获得用两个汉字来表示借词的形态效果，但是考虑两字联绵，借词的意义难从字面上得到反映，甚至有可能因为汉字本身的表意功能而导致借词出现歧义，所以对于有些情况也不乏增字以加强借词的表意效果，譬如：“基督教”、“道林纸”。

三 特别借词

3. 1所谓特别借词，指的是借词形成的过程并没有经过音译的语法消化，而是直接以原形态整体移植。大略也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或者说这一节讨论的第一种借词方式，是最近数年才出现并很快蔓延起来的。这种方式具体说来就是不经翻译而直接引进原来所采用的非汉字的文字形式，因此较之利用现成汉字音译更直接和更快捷，譬如如今已是差不多尽人皆知的英语借词CT, WTO, bye-bye, O.K.。汉字表词是中国几千年一贯的文化传统，书面语文献突然杂入完全属于另一种性质和形式的非汉字符号，这对说汉语写汉字的中国人来说毋宁是一种心理上的挑战。

半个多世纪以前，文化伟人鲁迅先生创“阿Q”便有标新立异之嫌；词由名人所出，更兼这“阿Q”确实已经获得一种表示某种思想或精神的并且没有其他词所可取代的词的意义，虽则形式不伦不类而还是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其后，字母词的使用，主要是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范围逐渐扩大。舍汉字音译而成就字母词，究其原因，当然主要是在语言或文字形式转换的本身。引进匆忙以至来不及翻译的情况可能会有，但是舍汉字音译而径直采用所谓字母词的真正的动机恐怕就是借词汉化处理上的无措。譬如会有这样的时候，翻译家将要借的词翻译好，可是如果要把转换为用汉字写出来的汉语词—借词—公布于众，却很可能是

一种令人失望的结果，就是：无论对于词的意义理解还是对于音译中所选择的汉字——特别是医学名词，音译过程常常造一些读起来令人感觉疑似的字——的辨认，人们觉得反而不如采用原文便利，或者感觉没比原文形式好出多少。现在，说汉语写汉字的人最终能否接受字母词这种特殊形式的借词，这是借词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语言现实。

受这种方式的借词的影响，汉语自身也涌现出少量的自源性字母词。所谓自源性字母词，指的是某些流通广泛的汉语专门用语其拼音形式缩写成词。汉语自源性字母词的出现，必然会形成一种汉外两种字母词并存的奇特而混乱的现象。当然，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字母词，自源性的汉语字母词任何时候都不能转化为借词，尽管它所采用的原本是西方语言使用的字母和仿似西方语言的文字形式。譬如，近年来已在世界范围成功推行的“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取“汉语水平考试”其中三个复字汉语拼音首母得HSK。由于该词的通行范围不限于国内，目前这个字母词的一般读法，不是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当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对这些拉丁字母的规定读音，也不是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这些字母充当声母的习惯读法，而是采用很多人更加认可的英语读法。看来这是个怪胎。类似的产生于其他背景的自源性汉语字母词，也都一例采用英语的读法，譬如：RMB（人民币）、CAAC（中国民航）、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

很明显，自源性的汉语字母词，因为受到数量众多的他源性字母词的包围，它的产生和生存面临着语言的和非语言即社会的多方面的冲击，不会出现广阔的发展前途；而从已经出现的为数不多的汉语字母词所表示的意义看，都有相对广泛的国际性的使用背景，而这也正是这些汉语字母词能够赖以维持它们的暂时作为汉语词汇成员的真正的原因。

3. 2汉语中的另一种特别借词，是本章开始时就提到过的借自日语的所谓日源汉字词。所谓日源汉字词主要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古代汉语里有

些词，这些词曾在汉、日语两种语言的历史交往中被日语吸收而成为日语中的汉语借词；到了近代，日本率先学习西方并直接用先已吸收的古代汉语借词表意，从而很多这样的单位取得作为某些西方语词的意译词的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曾经是由汉语移植于日语而后来通过意译而产生了表示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观念的意义的汉字词，重新“借”或者说“接”回到汉语的时候，多数情况是：日语最初所自借用的古代汉语的词的本原形式久被历史封存，不再作为后代汉语的词汇成员，因此辗转从日语中“接”回而实际上应当视为日语借词的某个汉字词便成了唯一存在的形式，因此也就促成了它的真正作为借词的语言学性质。譬如“文明”，较早见于《易·乾卦》：“天下文明。”其中的“文明”，意思是文理光明。从现代汉语的角度看，古代汉语表示“文理光明”的“文明”与辗转借于日语的表示“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意义的“文明”，实属不相演衍、毫无瓜葛的两个词。再如“学士”，《史记》有言：“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这里的“学士”意思是“学者”。至魏晋，“学士”亦曾用为官名。可以看出，这里的表示“学者”意思的“学士”与借自日语的表示“最低一个等级的学位”意思的“学士”，也是意义不相属从，很明显是不存在任何关联的两个词。至于像“化学”、“电池”、“塑料”、“环境”、“卫生”、“积极”、“消极”、“乐观”、“悲观”、“主观”、“客观”等这些纯粹由日语单方面形成的复字，它们又与同样采用汉字形式但已经发生意义异化的“文明”、“文学”、“学士”等汉源复字很不相同；在性质上，它们作为源于日语的借词更加与汉语不存在源生关系，而是属于典型的日语自源词。只不过日语的这些词汇单位，它们在当初以复字形式成词时，总是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所组成的汉字的表音兼亦表意的双重特点，而不管这被考虑的意义实际来自汉语还是来自日语。这一方面的问题，本章限于篇幅暂不多做讨论。

借自日语的汉字词，固然有汉字可鉴，很容易证明它们的早期的汉语语源关系。但是，我们却不能忽略它们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即作为日语词汇单位的汉字词它们实际具有的日语语音形式。就是说，日语中固然有数量相当可观的汉语借词，并且多数仍旧袭用原来的汉字书写形式，但是作为日语的词汇单位它们所采用的却是一实际也只能是一日语的语音形式。而作为借词，尽管汉字这种文字形式不利于词汇融合，但它不属于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真正决定将数量可观的古代汉语词汇单位以借词身份融入日语的，是日语的语法和随后对待借的词汇单位进行语法消化的语音改造过程。如同日语吸收其他语言的词汇单位作为自己的借词的情况一样，语法检验和语法消化是实现词汇融合的一个必要的程序；缺少这个程序，任何形式的借词都是不可能产生的。刚才我们关于把日语早期从汉语中借走的汉字词重新“借”或者“接”回的议论，那只是就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辗转汉、日两种语言之间并没有发生形体变化的汉字而言，也就是说，是就其中曾经帮助某些汉语词汇单位以借词身份实现在借用语言即日语中、其后在使用中改变了意义而并没有改变形式、最终又“完璧归汉”的汉字这种文字形式而言；而在作为借词的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所谓“完璧归汉”却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对某些具有汉字形式的日语词汇单位实行向汉语作简单位移的机械的物理过程，而必须经过音译以使这些特殊身份的日语借词除已具有的汉字书写形体之外同时还要取得汉语的语音形式。显然，现代汉语中的这部分日语借词纯属音译性质；而从作为借词组成成分的单字看，这些日语借词又跟古代汉语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很像意译词。实际上，我们说很像意译词也只是“貌似”而实则“神离”，因为这些今天成为汉语中的日语借词的词汇单位，它们所具有的意义属于在日语中最后形成的意义——且还不说另有一部分纯粹由日语单方面形成的汉字词——，所以仅仅汉字形体上的一致并不能证明它们跟古代汉语的相应单位是建立在历时意义上

的同一个词汇单位（刘叔新，1990）。

我们也必须看到，就汉语中的日语借词而言，汉字为借词的最后实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不管是通过改造已有的汉字进行音译，还是利用现成的汉字进行音译，汉字都属于在语言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完成借词的关键时候出来干预，实际所起的作用就是语音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汉字表音兼亦表意的双重性质，汉语中的借词常常能够同时取得与一般汉语自源词相区别的形式特征。这种特征，前面的讨论曾经论及，我们称之为“亚形态”。

四 论“意译”

4. 1萨丕尔（E.Sapir，1921）说，任何语言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借用，包括词的借用和语法的借用，而最现实和最容易发生的是词的借用，结果就是几乎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有源自其他语言的借词成分。

前面讨论借词的性质时，我们提出通过音译“仿制”而得借词。这其实是最简单易行的借词实现方式。与音译——当然不排除音译过程中必要的附加性质的意译——相比，意译则实际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意译算不算借词，固然理论上可以轻易做出否定的决定，而实际在词汇学意义上倒也无关紧要。问题是，意译同样是为所在语言增添新的词汇成分。

“咖啡”为音译英语 coffee 而得，自然是典型的借词；而词有形式和意义两部分，所以由音译而得的借词借音兼亦借意。“热狗”为意译英语 hot dog 而得，很多词汇学理论著作不承认它是借词，因为“热狗”只是借意，从这个典型的汉语词身上人们不容易联想到它会是一个别的什么语言的词汇单位的汉语替身，而这也就成了意译词不算借词的一种根据。可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汉语不仅增加了“咖啡”，也增加了“热

狗”，虽然后者不被看作是借词。

意译同样具有丰富语言词汇的作用，并且通过意译方式完成的词汇借用——或者连借用也不能说，那就只能说是吸收——大都是说本族语的人所喜闻乐见的。前面我们提到过，一般说来，人们容易对语言中的外来成分怀有一种排斥的心理。从这点看，语言中由意译而得的词不被称为借词的说法似乎反倒找到了一种可以引为心安的理由。

就通过其他语言而获得新词的词汇创造过程而言，人们欢迎意译，但意译并不容易。

4. 2在汉语历史上，为了实现意译而同时要使人们了解意译词的出身而有意留下一些标记，无数先贤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各种的汉语词典所记录下来的用“胡”、“番”、“西”、“洋”作前缀的词汇单位，很多属于意译词。下面看一些例子：

胡：胡豆（即蚕豆）胡筴 胡椒 胡麻（即芝麻）胡琴 胡桃

番：番邦 番菜 番瓜 番椒 番茄 番薯

西：西餐 西服 西瓜 西红柿 西葫芦

洋：洋白菜 洋布 洋车 洋葱 洋灰 洋火 洋琴（又作扬琴）洋铁

从上面这些复字形式的词汇单位看，大概都是后字表示意类，前字标记出身即复字所指事物之所自。

从产生的时代看，所举四个复字前缀，当属“胡”字为最早，从“胡”用为指示外域事物的复字前缀的年代看，汉代得名者较为多见。《词源》注“胡”字为我国古代对北方边地与西域的民族的泛称，同时说明以后也用于一切外国。“胡豆”一词《词源》未收，《现代汉语词典》以同义互训的方法释“胡豆”为“蚕豆”，另为“蚕豆”解义：“一年或二年生草本植物，茎方形，中心空，开白花有紫斑，结荚果。种子供食用。”《词源》释“蚕豆”云：以豆荚状如老蚕而名，或谓以蚕时始熟而名。“胡豆”以“胡”称“豆”还属于对于外域事物的一种带有模糊性质的临时命名，

名词本身缺乏对于所指事物本质特点的必要的概括和揭露，至于“蚕豆”，通过复字明白揭示其得名之由，可以认为这是名副其实的意译。

汉时固已有称我国西部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为“番”者，但用为前缀则主要见于唐宋而尤以宋代为著。例中“番茄”、“番薯”之得名，概如“胡豆”，也带有临时命名的性质，现代汉语分别改称为“西红柿”、“红薯”即是很好的证明。

“西”字在汉语史上曾用以泛指西域。春秋时“西”谓西秦，宋代亦谓西夏为“西”。后世用“西”字为复字后缀，则大约始于近代或稍前一段时间。以“洋”称域外之人或物，时间不比“番”晚但主要见于粤方言，吴方言较多使用“西”或“洋”。（陈原，2003）现代汉语中用“西”为复字前缀的词语，虽然考其得名之由算不上地道的音译词，但也没有社会学意义上的“崇外”色彩，用之既久则大都得以保留下来，并且也很少出现特别的形式上的改造。相比之下，“洋”字与“西”字虽大抵同义，而“洋”字用为复字前缀则更加广泛，并且曾经风靡一时，诸如“洋布”、“洋车”、“洋钱”、“洋铁”等凡属舶来之物，一例以“洋”称之，可谓应有而尽有。由于“洋”字的明显的“崇外”色彩，尤其在中华民族随着政治经济的不断自强，“洋”字前缀的生产能力受到抑制，原先出现的带“洋”字的复字开始接受检查，前面所举使用了“洋”字的名词悉数更名；只留下“洋琴”，现代汉语多又写作“扬琴”，“洋白菜”则也另外取了一个更能反映这种蔬菜的形式特点的名字，叫做“圆白菜”。

“洋灰”这个词另有其更为复杂的经历。最初由外国引进这种建筑材料时，广州话音译而为“士敏土”，上海话音译而为“水门汀”。由于说汉语的人对于音译词的天然的抗拒心理，一度出现了采用“洋”字前缀构词的“洋灰”；使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又因为建筑工程师们对于“洋”字的反感，最后产生了今天仍在使用的真正称的上汉语化的意译词“水泥”（陈原，2003）。

五 结 语

现代汉语里的借词，原则上分为音译词和意译词两类。

由于汉字表音兼亦表意的特点，现代汉语所存历史上形成的音译词大都采取依形声字原则另造汉字的方法，既完成音译又标志借词语源，如较早出现的“佛”、“塔”和近现代产生的“咖啡”、“啤酒”；依声而采用现成汉字音译主要实行于晚近，如“萨其马”、“巧克力”、“基督教”、“拖拉机”。最值得注意的音译词还有两类：一类是日源汉字借词如“思想”、“思潮”、“文明”、“文学”，虽然文字形式反映并蕴藏了汉日两种语言长期密切交往所形成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但从借词的语言学本质看，它们其实属于纯粹的音译词；一类是源自非汉字语言、未经消化而融合进来的所谓字母词如CT、SARS，受其影响，跟着这类借词出现了自源性的汉语字母词如HSK，从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同时向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提出了挑战。

意译为词向来属于语言接触过程中词语借用的最好方式，虽然一般语言理论不把音译词视为借词。实际上，很多音译词形成过程兼用意译，譬如“啤酒”、“基督教”。英语beer音译为“啤”乖于现代汉语复字为词的主流词汇形式因而增加“酒”字，Christianity音译为“基督”意义不显故而增加“教”字，由此也正可以看出音译作为借词手段的局限性。

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通过借词而丰富自己的词汇，使音译变为意译或者使音译兼能具备意译的品质，或许是为光明大道。

注释:

① “哇啦”、“噗呻”四字，严复译《社会通铨》造的都是左边从鼠、右边记声的形声字，说明严氏知其为鼠类，为此物中国所无而不便仓促命名，乃临时用以“鼠”表类的形声字记之。笔者不明机器造字之法，只得以现有之“口”旁字代替严氏之“鼠”旁字。又，“噗呻”的“呻”

字，非由严氏原造鼠旁字变来。原字左边从鼠、右边从生，现有汉字既无左“口”右“生”之字，笔者又乏机器造字之术，为收以“口”易“鼠”四字一例之效，不得已取音近有“口”之“呻”字替代。

参考文献:

- 陈 原 2003 《语言和人》，北京：商务印书馆。
- 刘叔新 1990 《汉语描写词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萨丕尔 1921 《语言论一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译，陆志韦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张 旭 2004 现代汉语形态研究刍论，日本神奈川大学《人文研究》153期。
- 《现代汉语词典》（增补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辞源》（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Views on the loanwords in the Modern Chinese

ZHANG Xu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several different borrowing ways of the Chinese loanwords, especially the transliterated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words from Japanese, have been discussed in detail. On the basis of it, both of the traditionally distinguished transliterated words and paraphrased words have been theoretically analyzed and the abuses of the very distinction have been pointed out at the same time.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oanwords; transliterate; paraphrase; Chinese character words; letter words; submorphology